

《重庆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 编

重庆 百科 全书

重庆出版社

《重庆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 编

重庆 百科 全书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庆百科全书 / 《重庆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9. 12

ISBN 7-5366-4349-7

I. 重… II. 重… III. 重庆-概况-百科全书 IV. K927.19-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6901 号

重 庆 百 科 全 书

《重庆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 编

责任编辑 蒲华清 叶小荣 余国枢 赵天惠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聂丹英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内陆商务广告有限公司排版

重庆蜀星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1/16 印张 88.625

字数 2800 千 插页 43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66-4349-7/Z · 43

国内定价: 220.00 元 国外定价: 180 \$

《重庆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

顾 问	贺国强	包叙定	王云龙	张文彬	刘志忠
	于汉卿	滕久明	冯克熙	肖祖修	程贻举
	窦瑞华	罗淑芳			
主 任 主 委 员	王鸿举				
	刘成义	贾培基	叶贵本	陈际瓦	吴连帆
	张 复	杨荣良	张 勤	高葆旺	李昌伦
	余楚修	黄绍辉	钟修文	俞荣根	管维良
	邓 申	裴家常	戴家福	王学斯	薛文琪
	陈万里	马述林	王根芳	于学信	李华年
	王洪华	姚代云	李祥龙	蒋国昌	王胜利
	石胜福	侯剑波	廖宗元	冉茂民	王国经
	范正兴	谭大辉	鲁荣平		
主 编 副 主 编	刘成义				
	贾培基	叶贵本	余楚修	黄绍辉	俞荣根

《重庆百科全书》各分编编纂委员会

历史分编

主 任 钟修文

副主任 管维良

地理分编

主 任 邓 申

副主任 裴家常 王国经

政治分编

主 任 陈际瓦

副主任 戴家福

经济分编

主 任 吴连帆

副主任 张 复 王学斯 薛文琪 陈万里 马述林

建设分编

主 任 王根芳

副主任 于学信 杨荣良

科教文分编

主 任 张 勤

副主任 李华年 王洪华 姚代云 李祥龙 蒋国昌

社会分编

主 任 高葆旺

副主任 王胜利 石胜福 廖宗元

人物分编

主 任 李昌伦

副主任 侯剑波

《重庆百科全书》编辑部

主 任 余楚修

副主任 何文君 郭永彬

前 言

《重庆百科全书》是一部记载重庆从古到今的基本知识、基本情况的工具书。由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编纂出版。从 1995 年 12 月开会动员布置，经过三年多的组稿、编纂，现已付印。全书共 6 000 个词条 280 万字，是重庆科学文化事业的一项重大基本建设。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重庆要走向世界、世界要了解重庆，应时代要求而编纂的《重庆百科全书》，必将为人们了解重庆、认识重庆发挥“窗口”作用。它通过重庆市域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演变过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介绍，为国内外广大读者全面了解重庆的昨天，认识重庆的今天，预见重庆的明天提供帮助；也将为重庆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巨大的社会效应。

作为地区性的《重庆百科全书》，既是工具书大家族中的一员，又有其独特的重庆特色：首先，它收录的内容均属于重庆市域内具有稳定性的基本知识、基本情况、基本资料，同时注重反映了新的发展变化，能全面体现重庆的现实市情。其次，它坚持科学性的要求，充分吸收了前人积累的知识成果，内容真实可靠，具有权威性。再其次，全书的表现形式，参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体例，以词条为主，但各学科和门类基本都有概观性的综述词条，兼顾了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这些特点，使之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不同于新编的地方志和年鉴，也不同于其他单一学科的百科全书。

《重庆百科全书》由重庆市人民政府组织编纂，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承编。编纂工作得到市级各部门、各区县（自治县、市）党委、人民政府及各主要企事业单位的大力支持，有 700 多位专家和专业人员参与撰写词条。编辑工作采用系统论、控制论的原则，基本做到了大而不乱，全而不杂，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可以说，这部大型工具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前人和今人知识成果类聚。

在三年多时间内编写出这样一部百科全书，工程浩繁，涉及面广，特别是重庆市刚直辖不久，又有万县市、涪陵市及黔江地区建制划入市域，一些部门对全面的资料、数据尚未统一综合起来，因此在少数资料和数据包括单位和人物的选介中都难免有疏漏和缺陷，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使本书以后再版时能有所改进。

《重庆百科全书》编辑部
一九九九年十月

凡 例

一、本书正文由词条组成，没有释文的参见词条，标出有参见词条的页码。附录有分类目录、音序目录、部分企事业单位目录、彩色图片目录、笔画索引。

二、词条是全书的主体，概述文章主要是简要介绍重庆市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概貌。词条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三、为使分类目录能反映重庆市的全貌和词条与词条之间的层次关系，便于读者系统阅读和查检，分类目录采用阶梯式方法编列。

四、本书纪年，清代（包括清代）以前用年号纪年，同一词条同一年号首次出现时加注公元纪年；清代以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五、科学技术术语以有关部门审定的为准，未经审定或尚未统一的，则用习惯术语。今地名以重庆市地名委员会审定的为准；历史地名按原地名书写，后括注今地名。

六、计量单位一般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依据，部分也使用当时之习惯计量单位，援引古籍中统计数字所用计量单位维持原来的不变。

七、单一性词条统计数据一般截至 1995 年底，综述性词条统计数据一般截至 1996 年底，有的资料截至 1997 年底。

八、正文除个别字必须用繁体字的以外，一律用 1986 年国家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中的简化字。释文所用数字，除习惯用汉字表示外，一般用阿拉伯数字。

概 述

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又是中国西部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水陆空综合交通枢纽、对外贸易口岸、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在行政建制上原为四川省辖副省级国家计划单列市，市域面积原为 23 114 平方千米，1996 年 9 月 1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重庆市代管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后，幅员面积详查数增至 82 339.36 平方千米（市统计局数为 82 403 平方千米），辖 43 个区（市）县，73 个区公所，1 502 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其中建制镇 642 个，街道办事处 80 个，乡 780 个）。1996 年末，全市总人口 3 022.77 万，其中非农业人口 577.11 万，占总人口的 19.09%。1997 年 3 月 14 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八届五次大会决定，设置为中央直辖市。1997 年 12 月 20 日，经中央批准撤销万县市及其所辖龙宝、天城、五桥区，设立重庆市万县区（后改为万州区）和万县移民开发区（市的派出机构）；撤销涪陵市及其所辖的枳城、李渡区，设立重庆市涪陵区；撤销黔江地区，设立重庆市黔江开发区（市的派出机构）。民族以汉族为主，居住有汉、苗、土家、回、藏、彝等 53 个民族。其中黔江、涪陵、万县地区聚居的苗族、土家族较多；黔江地区 5 个县均为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地形大致走势为从南、北向长江河谷倾斜，起伏较大。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成层性明显。气候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冬暖夏热，少霜雪，雾多，日照少。

一、悠久的历史 光荣的革命传统

重庆所辖的古巴渝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在万县市巫山县大庙区龙坪村发现的我国最远古的原始人类化石，距今已有 200 多万年。这些原始人类活动遗迹，与铜梁县发现的 4 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遗迹有许多共同的特征。10 多年前在重庆市区长江两岸发现的 20 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遗物也说明，在四五千年前，重庆沿江两岸已有比较稠密的部落分布。

公元前 11 世纪，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推翻商朝统治后，分封姬姓宗族于巴，巴国以江州（今重庆）为首府，逐步控制了以长江、嘉陵江为腹心，“东起鱼腹（今奉节），西至樊道（今四川省宜宾市），北接汉中（今陕西省南部），南极黔、涪（今彭水、黔江及贵州东北和湖南西北部）”的巴渝地区。周慎靓王五年（前 316 年）秦灭巴国，统一中国后在全国设 36 郡，周赧王元年（前 314 年）置巴郡，郡治在江州（今重庆），并由秦将张仪筑江州城垣。

西汉至北周重庆州名屡易。南朝梁太清四年（550 年）于巴郡置楚州；北朝西魏改楚州为巴州；北朝北周孝闵帝元年（557 年），复改巴州为楚州。隋开皇三年（583 年），改楚州为渝州。北宋崇宁元年（1102 年），改渝州为恭州。

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 年），赵惇先被封为恭王，后即帝位，自诩“双重喜庆”，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得名，至今已有 800 多年。

元朝在全国置行中书省，代行中央权力，下辖路、府、州、县，至元十六年（1279年）重庆府改重庆路，为四川行中书省九路之一。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明玉珍率农民起义据蜀称陇蜀王，曾于至正二十三年称帝，国号大夏，年号天统，定都重庆。夏天统四年（1366年）卒，其子明升继位。明洪武四年（1371年），夏国为朱元璋所灭。

明朝统一中国后，在全国置省、府、州、县四级，重庆为四川省13府之一。

清朝在全国置省、府、州、厅、县建制，重庆仍为四川省的一个府。

清宣统三年十月初二（1911年11月22日），重庆成立蜀军政府，1912年2月与成都四川军政府合并。1920年后，重庆一度为刘湘等军阀割据。1921年，刘湘设“商埠督办”；次年邓锡侯改“商埠督办”为“市政公所”；1926年，刘湘又改“市政公所”为“商埠督办公署”；1927年潘文华改“商埠督办公署”为“市政厅”。1929年2月15日，按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市组织法》，将“市政厅”改为“重庆市政府”，重庆正式建为四川省辖市，但其设官分职与当时的特别市相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1月2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重庆，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新址办公。19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明令改重庆为行政院直辖市。次年9月6日定重庆为陪都，并成立直隶行政院的“重庆陪都建设委员会”，制订《陪都十年建设计划》。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于次年5月5日发布还都南京令，并明确还都后重庆仍为陪都及行政院直辖市。当年正式完成的《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要求把重庆市建成西南的工商重镇、内陆良港、现代化的西南最大都市。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为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重庆市为中央直辖市。1954年7月1日，西南大区撤销，重庆市由中央直辖改为四川省辖。1983年3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准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中，决定撤销永川专区，将原永川专区所属8个县划归重庆市领导；并决定对重庆市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社会事业发展计划实行单列，市享有省级经济管理权。1996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决定将四川省辖的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划归重庆市代管。1997年3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八届五次大会决定，改重庆市为中央直辖市。

重庆在有文字记载以来的3000多年历史中，一直是中国西部重要的一个政治、军事和经济重镇。在宋代以前，因地势险要，它作为一个高垒深墙的军事城邑和区域统治中心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到了宋代，由于生产力有了发展，城市人口逐渐增多，商业日渐繁荣；清朝中期，西南经济和川江水运有了很大的发展，重庆已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以转口贸易为主的商业性城市；清光绪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1891年3月1日），重庆正式开埠后，西方的近代工业生产技术传入重庆，陆续出现了一批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工业，使重庆跨入了近代城市的门槛；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工厂迁渝，使重庆因内迁而盛，成为大后方最大的多功能中心城市；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十年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重庆的中心城市的地位作用有所加强。

重庆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早在秦朝时期，就曾发生过白虎族反对秦王朝残酷压迫剥削的群众革命运动。以后巴郡人张修领导的“五斗米教”起义，还建立过以今陕西汉中为中心的农民政权。到了唐朝，僚人多次起义反对地主阶级的奴役，延续时间长达百年之久。南宋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与宋军在合州（今合川市）反复争夺达半年之久。

清朝末年，清王朝顺应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激起了重庆人民风起云涌的反抗斗争。光绪二十二年至光绪二十五年，重庆“大足教案”发展成声势浩大的反洋教农民起义，起义军占领了大足、铜梁、荣昌、璧山、合川等县城，并发布告示“誓雪国耻”，震动了全国，打击了腐朽的清王朝和西方侵略势力。

光绪三十一年，孙中山建立同盟会，当年四川省第一个同盟会组织——同盟会重庆支部成立，以后便成为川东南 57 个州县同盟会的领导中心。宣统三年（1911 年）同盟会重庆支部成功地发动了反清武装起义，并于 11 月 22 日在重庆成立了“蜀军政府”。这是继湖北武昌起义后，全国第 14 个宣布独立的省级地方政权，有力地推动了辛亥革命在四川及全国的发展。

1919 年，“五四”运动消息传出后，重庆川东师范、重庆联中、巴县中学等校学生代表迅速集会，并致电联络京津各团体一致行动，成立“川东学生救国团”，发表《救国团宣言》和《哭告同胞书》，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6 月“川东学生救国团”改名“川东学生联合会”，领导川东地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并办了《川东学生周刊》，宣传新文化、新思想。8 月，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创办的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开学，邓希贤（邓小平）、冉钧、聂荣臻、帅本立等一批青年学生，在重庆留法勤工俭学分会的帮助下，陆续由重庆启程赴法国。这批留法青年学生中，有许多人在欧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回国后成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领导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五四”运动以后，重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与商界、工会等各界相互配合，持续地开展了反帝、反封建和反军阀统治的斗争，还办了《新蜀报》、《綦评》、《友声》、《巴声》、《商学半月刊》、《工务日报》、《平民日报》等一批揭露和抨击黑暗势力，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报刊，政治、学术思想空前活跃。

1922 年 10 月 9 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正式成立，这是重庆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由周钦岳（曾赴法勤工俭学）任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并报告团中央请求承认。团中央于 1924 年 1 月正式批准承认重庆地方团组织。重庆团组织成立后，与市工会、学联、商会、记者团等联合开展民权运动、裁军运动和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及马克思主义等活动。次年，重庆团地委内开始发展中共党员，杨闇公、童庸生等主要骨干首批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均留在团内工作。

1926 年初，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共重庆支部成立，冉钧任书记。同年 2 月，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后改称重庆地委），杨闇公任书记。当时由于四川的党组织和党员不多，省内各地陆续建立的党组织都由重庆地委领导，重庆地委实际是全川党的领导机构。重庆党的机构建立后，为推动北伐军顺利进军，将工作重点转向发动群众支援北伐，策动川军倒向国民革命军。9 月 5 日，发生英国商轮在云阳浪沉木船，造成国民死亡事件，万县驻军扣留了英国商轮，英 3 艘军舰炮击万县县城，打死 604 人，伤 398 人，毁房千余间。事发后，在万县驻军工作的朱德、陈毅立即发起抗英斗争，中共重庆地委随即发出指示，与国民党左派省党部一起组织 400 余个团体、50 000 余名群众，举行水陆两路示威大游行，抗议英帝暴行。接着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英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告民众书》，在全国掀起了反对英帝国主义斗争的怒潮。为了配合北伐斗争，中共重庆地委于 11 月成立军事委员会，由杨闇公任军委书记，朱德、刘伯承为军委委员。随后组织了顺（南充）泸（泸州）武装起义。12 月 1 日泸州驻军陈兰亭旅发动起义，打出了国民革命军四川第四、第五路军旗号。9 日刘伯承领

导起义军在顺庆（南充）召开起义誓师大会，并任命第一、二、三路军司令。这次历时 160 多天的武装起义，在四川军阀的围攻下虽然失败了，但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军事力量的首次尝试，为“八一”南昌起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927 年 3 月 31 日，中共重庆地委为抗议、声讨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阻挠北伐进军，调集军舰炮击南京城，打死打伤 2 000 余人的暴行，在打枪坝组织 2 万余群众举行“重庆各界反对英、美枪击南京市民”大会，遭到军阀刘湘第二十一军和民团的大屠杀，群众被打死 137 人，伤千余人。大会主席、著名经济学家漆南熏，左派将领陈达三当场牺牲。反动势力在现场屠杀的同时，还捣毁了国民党左派省、市党部和市总工会、新四川日报社、中法学校、中山中学等革命阵地。“三三一”惨案后，党的活动转入地下，重庆地委组织委员冉均脱险后，当天在七星岗遭军阀便衣枪杀。地委书记杨闇公，在召开部分党员干部会布置惨案后的工作后，于 4 月 4 日离渝赴武汉出席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途中在轮船上被捕，4 月 6 日在浮图关壮烈牺牲。7 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傅烈等入川清理恢复党的组织。8 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重庆成立，傅烈任书记。主要活动转向巴县、江北等邻近农村，准备发动农民暴动反对军阀，但均未果，党的组织多次遭到破坏，不少优秀的共产党员壮烈牺牲。但重庆党的组织和一批坚定的党员仍坚持活动，不懈地与军阀和国民党右派开展斗争。1930 年，在涪陵开展活动的游击队发展到 700 多人（枪）。在涪陵、石柱、丰都、彭水、武隆 5 县边境 10 多个乡，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土地革命。合川党组织的几次武装起义均未获成功，先后有 20 多人牺牲，70 多人被捕，但仍有许多党员坚持斗争。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重庆人民闻讯奋起开展反日爱国斗争，先后成立了“四川各界民众反日救国会”、“四川各界民众抗日救国大会”，连续组织游行示威、集会、罢市、罢工、罢课；查抄日货和绝食，下旗致哀；反对日本侵略，要求川军出川抗日等活动。以后各团体又致慰问电，献金支援东北抗日战士，有 5 000 多人报名参加抗日义勇军，抗日救国斗争不断高涨。次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抗日。重庆人民闻讯后，迅速掀起要求川军停止内战、出川抗日、支援上海抗日战士的反日浪潮。1933 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红三方面军、红六方面军在酉阳会师，蒋介石和刘湘一面加强对红军的进攻，一面加强重庆地区的反共镇压，压制人民群众和学生的爱国活动。1935 年 5 月，由于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被捕后叛变，全川党组织除个别地方外，都遭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仍有不少党员以公开或秘密的方式，与学生组织和其他社团一起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7 年，国民党中央军进驻并控制重庆。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公开成立，并与其他各界救国会联合，广泛开展抗日宣传。除《新蜀报》、《商务日报·副刊》外，新创刊了《商报》、《四川日报》、《人力周刊》、《春云》、《诗报》、《银行界》等一大批宣传抗日救亡的进步报刊，抗日救亡舆论阵地大为加强，抗日救亡声势不断壮大。5 月，重庆反省院中被监禁的共产党员开展绝食斗争，反对将政治犯交国民党中央，要求就地释放。经过斗争和各方人士的支援，国民党当局同意两月内全部释放政治犯。7 月 7 日芦沟桥事件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重庆人民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抗日救亡组织迅速壮大，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

成。10月，中共中央派人来渝，重建了两年前被破坏的中共重庆组织。

1938年10月，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人员和在武汉的《新华日报》迁渝。11月中共四川省工委撤销，分别成立中共川东和川西特委。川东地区党组织空前壮大，党员人数达3600余人。次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兼新四军）办事处在重庆机房街70号（1940年5月因日机轰炸后迁红岩嘴13号和曾家岩50号）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6人为常委。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中央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党的工作。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重庆的8年多时间里，坚定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加强大后方党的建设，领导南方的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和《限制异党活动法》等反动政策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共同坚持抗日战争到最后胜利，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并对以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创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山城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政策走向反动，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特务加紧了对共产党人的镇压，川东特委的一些领导人和一批县的组织遭到破坏。毛泽东和中央发表《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指出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应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蓄谋已久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周恩来在《新华日报》愤然题写：“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领导南方局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南方局、川东特委、重庆市委均组织秘密力量散发资料，揭露“皖南事变”真相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继续在国统区破坏中共组织。川东和重庆党组织的党员大都转到异地活动，只留少数骨干单线联系，保存了力量。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乘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调集四五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叫嚣解散中共，刁难迫害《新华日报》。南方局在重庆向国内外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引起强烈反响。在解放区军民的坚决反击和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指责下，国民党被迫停止向解放区进攻。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全国人民在欢庆胜利的同时，更加渴望国内和平。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与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张治中陪同下由延安飞抵重庆，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并通过秘密电台领导全党工作，指挥解放区的人民武装粉碎了国民党的进攻。毛泽东在红岩村还约见民主人士、外国友人，宣传解释党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并以自己优秀的思想、品德和作风赢得了人们的信赖和尊敬，促进了民主力量的团结壮大，推动了大后方民主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在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下，毛泽东在渝一个多月期间与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双方代表于10月10日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次日毛泽东和王若飞由张治中陪同飞返延安。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由于中国共产党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和绝大多数政协代表的努力与全国人民的推动下，会议终于在1月30日就政府组织、和平建国纲领、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军事等问题达成了协议。但国民党很快就撕毁了政协协议。2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在较场口召开有近2万人参加的“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国民党布置特务、暴徒捣乱会场，制造了打伤郭沫若、马寅初、施复亮及与会记者和群众60余人的震惊全国的“较场口事件”。事件发生后，中共代表团和政协参加单位代表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各界人士分别组成“二一〇”血案后援会，慰问受伤人员，发表声明抗议特

务暴行。3月21日,二十九兵工厂千余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特务警卫逮捕工人代表,并开枪打死工人4人,打伤8人。随后又有10多家工厂的工人罢工请愿,要求增加工资,反对资本家的残酷剥削。

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在周恩来率领下迁南京,成立中共南京局,四川党的工作由4月公开成立的中共四川省委负责,吴玉章以中共代表团驻渝办事处和四川省委的公开身份驻重庆,领导重庆党的工作和各种进步运动。同年7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进一步加强了对民主运动的镇压。中共重庆市委根据形势变化,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争。后来在华蓥山、云阳、奉节、巫山、巫溪和达县、大竹等地区开展了武装斗争。12月,北平发生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全国大中城市学生立即掀起反美抗暴斗争。重庆学生在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下,掀起了反美军暴行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参加人数之多超过了平津地区。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反动派限令中共驻重庆代表于3月5日前撤出,并派军警包围中共四川省委,强令《新华日报》停刊。3月7日~9日,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人员飞返延安。6月1日,国民党军警对学校 and 新闻、出版、文化、工商界的进步人士进行大逮捕,一天就逮捕270人。在严峻的斗争面前,在渝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法庭上、刑场上,面对死亡,临危不惧,表现了革命者的浩然正气。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文告,21日又宣告“引退”,推李宗仁代理“总统”,企图利用谈判争取时间卷土重来。31日北平和平解放,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的胜利结束,使国民党的精锐师团丧失殆尽,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抵长江,作为国民党统治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南京、上海、武汉处于直接威胁下。此时中共中央上海局派同志经香港到重庆,要求重庆党的工作由农村转向城市,实行“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方针,发动群众保护城市,保护工厂、学校,防止敌人破坏,加强统战工作,注意整顿组织和积蓄力量,不再搞农村武装起义。2月至4月,在重庆党组织领导下,重庆爆发了反饥饿、争温饱、争生存的大规模学生运动,并准备在4月21日举行全市抗议示威游行,后得悉国民党又要镇压的消息,为避免损失改为分区和在校内示威游行。此后,中共川东特委临时负责人开会研究了“迎接解放,配合接管”,加强统战、策反和护厂护校,以及营救白公馆、渣滓洞监狱中政治犯等工作。7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命第二野战军主力经湘西、贵州入川,贺龙率十八兵团从陕南入川。8月,蒋介石由广州飞抵重庆,召开军事会议部署阻止解放军入川,同时下令杀害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杨虎城全家并分批杀害政治犯。10月广州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又从广州迁渝。11月1日,第二野战军在湘、鄂、川、黔边境发动强大攻势,迅速向重庆逼近。国民党军警在仓皇逃跑之前,按蒋介石的指令,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大屠杀事件(9月6日杀害杨虎城等6人,10月28日杀害陈然、王朴、成善谋等10人,11月14日杀害江竹筠、李青林等30人,11月27日屠杀到了顶点,有许晓轩、谭沈明、刘国钰等近200人被押至松林坡杀害,国民党军警前后杀害革命志士共300多人)。烈士们为新中国建立捐躯,将碧血洒在了即将解放的山城大地上,他们为自由和解放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和崇高精神,在人民心中竖起了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解放后,国家把红岩村建成了革命纪念馆,把“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建成了烈士陵园,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重庆悠久的历史中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最近中共重庆市委号召弘扬“红岩精神”,就是号召大家学习以周恩来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在红岩村工作期间团结领导人民同反动势力

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中所形成的爱国精神、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坚持团结的精神、勇于牺牲的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及紧紧依靠和团结群众夺取胜利的优良作风。弘扬“红岩精神”，就要以实际行动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终实现全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丰富的自然资源 独特的区位优势

重庆市域地跨东经 $105^{\circ}17' \sim 110^{\circ}11'$ ，北纬 $28^{\circ}10' \sim 32^{\circ}13'$ 之间，位于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主要分布在长江沿线。东邻湖北、湖南省，南靠贵州省，西接四川省内江、遂宁市，北连陕西省和四川省达川、南充市；东西宽 470 千米，南北长 450 千米。市区处于长江与嘉陵江的汇合处，东距祖国最东端（含海域）3 186 千米，西距最西端 3 150 千米，距最北和最南分别为 2 925 千米和 2 934 千米，接近全国领土的几何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境内自然资源丰富，组合状况较好。由于市域内古老复杂的地质构造、多样的地形地貌、湿润温和的亚热带气候和以紫色土为主的农耕土壤，使重庆地区的生物资源、矿产资源都比较丰富，而且组合状况也较好，为重庆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土地面积辽阔。全市原有土地面积 23 114 平方千米，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划入后，土地面积增至 82 403 平方千米（详查数为 82 339.36 平方千米），有耕地 255.65 万公顷（市统计局统计数为 162.21 万公顷）。土地面积大，为第二、第三产业和城乡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地貌构成上，山地、丘陵多，平坝少。农民人均耕地有 0.1 公顷，坡耕地多，紫色土壤多，具有粮、经皆宜的优点，发展潜力较大。如山地多可发展林、牧业；丘陵多可发展多种粮食和多种经济作物；特别是三峡库区成库后，有广阔的水面可以发展渔业和旅游业。

生物资源种类繁多，农业发展有良好的基础。由于土壤、气候适宜，重庆地区的植物种类特别多。据不完全统计，维管植物在 4 000 种以上。自然植被有阔叶林、针叶林、竹林、灌丛、草地等 5 种，其中以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主。除野生植物外，有栽培植物近千种，其中水稻、小麦、玉米、红薯产量大，在全国占有一定位置；经济作物中的柑桔、柚、中药材、茶叶、蚕桑、烟叶、大木漆、桐油等都具有一定优势。动物资源有 600 多种，其中国家 1~3 类保护动物近 100 种。饲养动物有 70 多种，水生动物及鱼类 200 多种。猪、牛、兔在全国占有一定优势。

矿产资源丰富，分布相对集中，便于开采。市域内已发现的矿产有 60 余种，已探明储量的 38 种，主要有煤、天然气、锰矿、铁矿、铅锌矿、重晶石、毒重石、玻璃用砂岩、耐火粘土、萤石、锶、硫铁、岩盐、铝土、汞、石灰石、石膏矿等。其中天然气、锶、汞等的储量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铝土、锰矿、岩盐、硫铁矿、煤、石灰石、石膏矿等储量都非常丰富，分布亦相对集中，便于大规模开采。丰富的矿产资源，为三峡库区及长江上游经济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资源条件。

水资源丰富，便于开发利用。重庆地区水资源除自然降水年均在 1 000 毫米以上外，主要是市域内江河过境水多。市内水网密布，年平均水资源总量超过 5 000 亿立方米。长江从江津市朱沱入境，万县市扁鱼溪出境，全长 665 千米，它汇总川中之水，年入境流量达 4 600 亿立方米。主要支流嘉陵江、渠江、涪江、乌江，多年平均径流量均在 480 立方米/秒以上，其中嘉陵江平均径流量达 2 160 立方米/秒。境内积水面积在 100 平方千米的河流有 300 余条。江河多，水资源丰富，对发展航运、水电和耗水量大的工业有利，对发展大中城市及农

业灌溉也创造了条件。重庆地区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达 1 400 万千瓦，可供开发量为 750 万千瓦。地下热矿水、饮料水资源也非常丰富，可以大量开发利用。

旅游资源丰富，发展前景美好。由于市域辽阔，山脉起伏绵延，水网发达，有很多风景优美的名山大川和湖泊。“巴山蜀水”自古以峡谷风光为主要特色驰名天下。全市有 20 多个大的旅游景区，300 多个景点，开发配套日臻完善，已形成一批面向国内外的成熟的旅游线路。其中长江三峡是世界级峡谷风光，大宁河小三峡山青水秀，乌江峡谷号称天险，嘉陵江小三峡险峻幽深；缙云山号称“川东小峨眉”，江津四面山有地球同一纬度唯一幸存的原始森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川金佛山，集雄、奇、幽、秀于一体，是天然的动植物园。还有大足石刻、钓鱼城、红岩革命纪念馆、歌乐山烈士陵园等名胜古迹和纪念地。全市现已有旅行社、涉外饭店数百家，有各种档次的旅游车船和直达全国各大中城市的航空班机，并开通了到香港、日本等地的包机航线，交通十分方便。

重庆有独特的区位优势 and 美好的发展前景。

重庆独特的区位优势首先在于它位居嘉陵江、长江的汇合处，是祖国内陆腹心地带长江上游水系的中心、总汇，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港口和水陆空综合交通枢纽。在内陆铁路尚未建立前，它是云、贵、川及陕南与全国各地物资交流与人员往来的主要通道和转口贸易城市，历史上重庆城市就是因水运发达而兴起的。早在宋代，重庆已是长江上游的主要物资集散中心，贸易往来十分繁荣，“两江商贩舟楫旁午”，六街三市与沿江地区，已成为繁华的商业区，为当时全国著名商业城市之一。清末年间，重庆被迫开放为对外商埠，使重庆较快成为近代城市，也是由于重庆的水运发达。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大量工商企业能够迅速随国民政府迁来重庆，也都是由于有长江航运之便。新中国成立后，西南修了宝成、成昆、襄渝、川黔等通往全国的干线铁路，长江上游航运有些萎缩。但由于几条铁路的运量基本饱和，大量进出西南的物资运输仍然十分紧张。随着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成，川江航道将大为改善，万吨船队能直驶重庆，川江年运量将由现在的 500 万吨左右增至 3 000 万吨至 4 000 万吨，可以大大缓解西南地区物资进出的紧张问题。党的十四大提出的浦东为龙头的长江开发开放，建设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决策，就是要以沪、宁、汉、渝四大经济中心及沿江城市为经济点，以长江航道（包括规划中的沿江铁路和正在建设的大致与长江平行的高等级公路）作为流域经济的主“骨架”，通过“骨架”联系长江上中下游地区经济，从而联系整个长江流域，直至整个内陆。内陆地区可以通过长江经济带辐射沿海，走向世界，沿海和世界也可通过长江经济带深入广大内陆地区。重庆是长江上游的综合交通中心和长江流域四大经济中心之一，这种独特的经济地理区位，决定了重庆是长江上游地区辐射内陆、沿海，走向世界的“桥头堡”和流通中心；同时也要求重庆发挥老工业基地的作用，更好地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其次，重庆处于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资源富集地区的结合部，有利于承东启西，推动西部丰富资源的开发利用，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缩短东西部的差距，迅速赶上全国发展步伐。重庆开埠后，近代工业生产首先在西部的重庆发展起来，然后逐步向腹地纵深发展的例证，以及解放后重庆支援攀枝花等内地新兴工业城市发展的事实，都说明重庆能在东西部结合上发挥承东启西的传递作用。

再次，重庆处于中西部开发、长江开发、三峡工程及西南三大重点资源开发区（三峡库区、乌江水电及有色金属开发、攀西六盘水开发区）的复合经济中心地位。上述重点地区和重点工程的开发和建设，都处在国家规划的以重庆为中心的长江上游经济带的范围内，重庆

作为这个区域的中心城市，理应担负起服务、带动、共同发展的历史任务。当然，重庆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老商业城市，要发挥好长江上游经济带的中心作用，还面临着产业结构、城市结构的大量调整和改造工作，只有加快老工业基地的改造，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才能很快增强重庆的整体经济实力，增强对外的辐射力和吸引力，真正起好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作用。

三、国民经济几经跳跃发展 逐步形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

重庆虽是一座具有 3 000 多年历史的城市，但它作为经济中心城市，只不过百来年的时间。在漫长的原始城市 and 传统城市期间，城市经济虽然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到明清时期，已发展成为长江上游地区主要的物资集散中心和向中下游转口贸易的商业性城市，但是，那时的商业在整个地区经济中的比重仍不大，商品生产不占主导地位，国民经济的主体仍是农业，而不是商业和手工业。城市的发展不是靠城市本身的经济力量，而是靠农业经济发展的推动，城市受小农经济生产力低下的制约，所以发展非常缓慢。

清道光二十年（1840 年）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西方一些先进的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业传入沿海城市。重庆因深处内陆，开埠较晚，近代工业起步时间比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城市要晚二三十年，直到 19 世纪末重庆开埠才开始出现近代工业（首先发展的是火柴业，随后扩及丝纺、棉纺、玻璃、采矿、航运、电灯等行业）。这些新兴工业以及近代金融、近代教育、近代大众传播事业的兴起，使重庆城市的功能开始由传统城市向近代经济中心城市转变，城市经济占地区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增大。到抗战前，重庆的近代工业已在较为广泛的部门产生。据 1933 年《中国工业调查报》统计，当时重庆已有近代工厂和手工业工场 415 家，已是四川省最大的工业城市。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大举进攻，国土大片沦陷。炮火把国民政府赶到了重庆，也将沿海、沿江的一些工厂牵到了重庆。灾难与机遇同行，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重庆因内迁而盛，因救亡而兴，由一个小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一跃而为全国性（大后方）的多功能中心城市：既是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也是大后方的工业中心、流通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消费中心和科技、教育、文化中心，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亚太战区盟军的指挥中心，成为闻名遐迩的世界名城。这一时期重庆的工商业有了成百倍的增长，城市经济实力空前增强。据统计，到 1945 年，全市工业企业已发展到 1 690 家，职工达 10 多万人。商业有大小公司、商店 27 481 家，各种商业同业公会 123 个，从事商业的人口为总人口的 18.8%，占全市在业总人数的 39%。金融业共有银行 67 家，外商银行 2 家，钱庄、银号、信托公司 24 家，参加中央银行票据交换的 120 余家，保险公司 51 家。同时重庆的金融机构大多在大后方的其他城市设有分支机构，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金融网络。水上交通运输与公路运输也有很大发展，轮船公司多达 27 家，最大的民生轮船公司拥有各类轮船 116 艘。已经衰落的木船业也得到复兴，多达 1.6 万艘、25 万多吨位。公路运输除有与西南、西北各省相接的交通线外，还与中缅、中印、中苏等国际线路相联。航空也开有渝迪（乌鲁木齐）、渝蓉、渝昆、渝筑、渝港等以及到仰光、河内和印度、苏联等国内外航线。邮电线路也与大后方各省市及友邻国家有线路相通。1946 年 5 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部分内迁工厂员工纷纷复员，大量资金、设备、技术骨干撤离重庆，使重庆经济实力有很大削弱；以及国民党发动内战，造成国民经济全面萎缩，到 1949 年重庆解放前夕，大部分工商企业处于歇业和半歇业状态，失业人员高达 12 万人，全市工业总产值只有 3 亿元（按 1980 年不变价折算人民

币值)。解放后,重庆迅速恢复发展了国民经济。经过三年恢复时期和“一五”计划期的超高速发展,八年间全市工业总产值迅速增至16.62亿元,比1949年增长4.54倍,年平均增长24.2%,比全国平均年增长率高6个百分点。“二五”期的前三年工业生产仍保持高速增长,1960年工业产值达36.45亿元,比“一五”末增长1.19倍。1961年~1963年,由于大跃进工作上的失误和农业连续遭特大干旱,工业总产值又回落到1957年“一五”末期的水平。经过1963年~1965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工业生产有所恢复,但仍未达到1960年历史最高水平。1965年国家部署的“三线”建设,重庆以常规兵器基地建设为重点,迁建、新建了200多家大中型骨干企业。这些新的企业除少数是兵工厂外,大部分是与战备有关的原材料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通信设备制造和仪器仪表工业等,如西南铝加工厂、四川重型汽车厂、重庆造船厂、四川仪表总厂等,都是“三线”建设中建成的。“三线”建设,是重庆继抗战时期沿海工业大内迁的又一次大迁建,它对增强重庆工业实力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使重庆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一跃而居全国第五位。“三线”建设的10年期间,尽管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和破坏,重庆的工业生产总值仍增长65.82%。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进入了稳定持续发展期。“五五”、“六五”计划期间,重庆市贯彻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大力调整了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整顿了企业领导班子,特别是1983年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加快了改革开放步伐,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加强了横向经济联合协作,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1985年国民生产总值突破百亿元大关,达到104.65亿元,年平均增长率均在两位数,其中第一产业占26.91%,第二产业占50.95%,第三产业占22.14%。工业总产值达到139.37亿元,比1975年增长2.26倍。“七五”计划的前三年,国民生产总值仍以两位数速度增长,1989年和1990年,由于社会动乱的干扰和宏观上的紧缩,增长速度放慢。经过治理整顿,1991年起的“八五”计划期间,国民经济又出现持续高速增长的局面。到1996年末,全市各经济部门完成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及有关情况如下:

(一) 经济总量。全市国民生产总值完成1179.09亿元(现价)。其中第一产业284.89亿元,占24.16%;第二产业493.21亿元,占41.83%;第三产业400.99亿元,占34.0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914元(现价)。

(二) 工业。据1996年基本单位普查,全市有各类工业企业21068个,法人单位17870个,全部工业总产值(1990年不变价)1055.66亿元,乡及乡以上工业总产值(1990年不变价)727.21亿元。按轻重工业分,轻工业产值268.84亿元,占36.97%;重工业产值458.37亿元,占63.03%。按所有制分,国有工业总产值389.57亿元,占53.57%;集体工业总产值183.13亿元,占25.18%;其他经济成分工业产值154.51亿元,占21.25%。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结构的不断调整,已形成机械、冶金、化工、电子仪表、建筑建材、食品等支柱工业行业。1996年,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分别为:汽车12.42万辆,摩托车178.53万辆,钢160.67万吨,钢材129.29万吨,生铁132.9万吨,水泥780.61万吨,啤酒29.12万吨,卷烟90.95万箱,布4.99亿米,机制纸及纸版21.02万吨,铝材(改制钢材)6.4万吨,原煤2170.19万吨,发电量122.68亿千瓦时。还有通信设备、仪器仪表、精细化工、丝纺、特色食品等的产量也达到较大规模。1996年重庆独立核算工业企业11077